

跨湖橋遺址芻識

——一個八千年前文化遺址的啟示

／王屹峰

二〇〇一年跨湖橋遺址考古發掘（圖一）成果（註一），被評為當年度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註二）。

遺址位於浙江省杭州市蕭山區湘湖村。這裏曾經是一處煙波浩淼的湖泊，因其湖景宛若瀟湘，得名「湘湖」。古人曾有西湖如美人、鑿湖如神仙、湘湖如隱士的讚譽。湘湖至少在四千年前已成湖泊，後湮淤成田，自北宋起廢田築湖，湖形漸成橫置之葫蘆狀，西大東小。湖長九·五公里，寬〇·五至三公里不等。明代在湖中狹腰處築堤並建造跨湖橋（註三），遺址即以此命名（圖二）。近百年來，湖面復又廢淤為田。這種湖海相的沉積淤泥是最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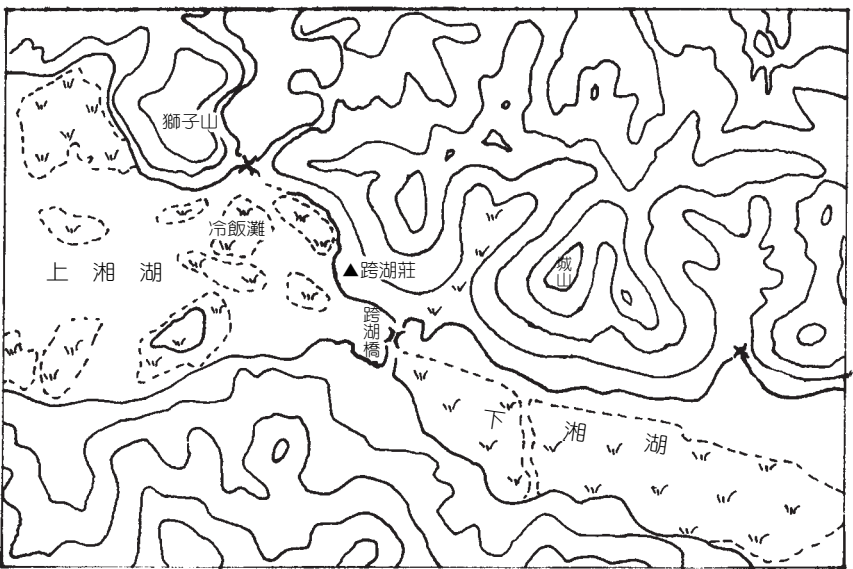


圖一 跨湖橋遺址考古發掘現場

燒磚製瓦原料，跨湖橋遺址就是在取土過程中發現的。

一、遺址的發現和發掘

在一九二七年的湘湖圖上（圖二），可以清楚地看到後來的發掘地點及其周圍，有五個低窪灘地，最大的一處叫「冷飯灘」，這說明



圖二 一九七二年湘湖圖局部（據一九八七《蕭山縣誌》改繪）

當時遺址尚未遭到破壞。根據當地村民的回憶，大約五、六十年以前，開始有人在此挖泥燒磚了。大規模地興辦磚瓦廠的時間在一九七〇年以後，也正是在那個時候，當地的一位醫生意識到了從泥土中伴出的陶片、獸骨等東西可能是文物，可惜未能像幾乎同時發現的河姆渡遺址那樣幸運地引起人們的重視。

不久，跨湖橋遺址的絕大部分被徹底挖空。僥倖的是，一九九〇年，遺址東南唯一殘存的一個角落被幾位業餘文物愛好者陸續發現，遂引起了蕭山文物部門的重視，才有了當時對遺址的第一次搶救性發掘（註四）。

自一九九〇年以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杭州市蕭山區博物館已經對跨湖橋遺址進行了三次發掘和一次試掘。一九九〇年主要揭露了局部的建築及灰坑遺跡，陶器只修復了少量幾件。二〇〇一年的第二次發掘（註五）獲得了豐碩收穫，修復的各類造型獨特的陶器就達一百五十件之多，陶片中彩陶佔一定比例，還出土了大量的骨、木、石器和各種動物骨骼、植物種子以及水稻、篾或葦類編織物等標本，從而確定了一種嶄新的考古學文化類型（註六）。二〇〇二年又揭露出了一條殘長尚達五·六公尺的獨木舟。

一九九〇、二〇〇一年兩次發掘共十一個標本，由國家海洋二所和北京大學經碳十四測定及樹輪校正，數據集中在距今八千至七千年之間，成為浙江迄今發現的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超過了河姆渡遺址的測定年代。

二、水性蓋層

湘湖湖底沉積著三至四公尺厚的淤泥，發掘時所見最厚處達四·六公尺，直接覆蓋在跨湖橋遺址文化層之上（圖三）。這些淤泥單純、細膩、緻密而且水分高、粘性大，以致於二〇〇一年在我們發掘的時候，要清除它還十分費勁。

這層厚厚的淤泥一直阻隔著空氣進入文化層，長期保持著極為難得的埋藏環境。跨湖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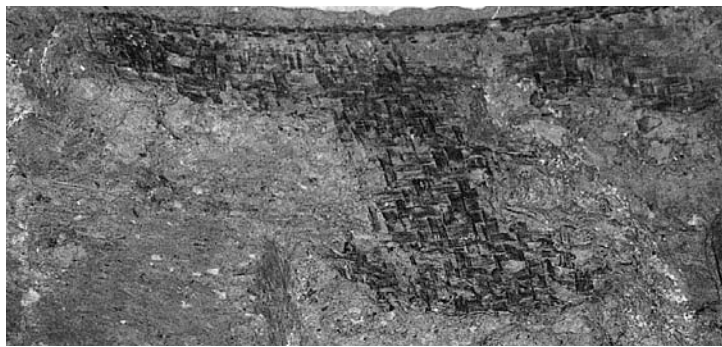
遺址保存下那麼多的有機質遺物，像木器（圖四）、骨器、篾或葦類編織物（圖五）、稻穀、植物莖杆（圖六）、植物種子、動物骨骼，都有賴於此，甚至有的木塊出土時色澤如新。這樣的淤泥層類似於歐洲考古學上的「水性蓋層」（註七）。雖然水性蓋層減緩了各種有機物的氧化過程和抑制了許多能夠分解有機物（尤其是植物類）的不良土壤微生物的繁殖，但是由於地層中含有鹼性鈣質物，因而動物的皮、革、毛等非碳化物還是滅跡了。這就是為什麼跨湖



圖三 深色文化層和淺色淤泥層（已取去二公尺餘）



圖四 殘木盤出土時狀況



圖五 篾或葦編簸箕

橋遺址保存下這麼多動物骨骼，而沒有一件獸皮留下來的原因。

從跨湖橋遺址這層直接疊壓在文化層之上的水性蓋層性質非常單純推測，遺址的廢棄可能是由於水的負面作用，並且此後遺址所在地點一直處於水環境外，即使在沒有水層覆蓋的情況時，這裏仍然是一片低窪澤地。處於跨湖橋遺址的北、西兩側的低矮山岡，歷史時期即是錢塘江口與杭州灣連接處的南岸，在遠古時杭州灣的喇叭口遠甚於今，江海之水的侵漫能力也非常當時人力所能阻擋，甚至在某一階段這些山岡還曾經淪為杭州灣灣口的幾處島嶼。

在許多遺址的發掘中都可以遇到不同類型的水作用層，水性蓋層是其中之一，在其形成的後面，隱藏著一個複雜的環境變遷問題。同時，也提醒以後的考古發掘中，遇到這類水性蓋層時應該提前準備好有可能大量出土的有機質文物的保護方案。

三、遺物舉例

由於跨湖橋遺址內涵的新穎、豐富和複雜，資料的整理、分析也相對困難得多，因此目前只能簡單介紹數例出土器物，並略作淺層次地比較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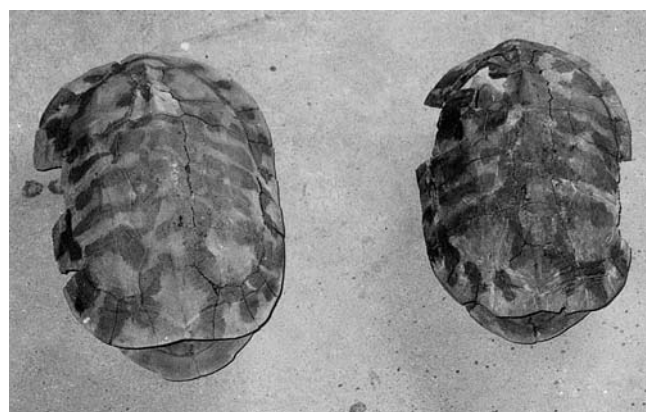
圖六 植物莖杆及所盛之陶釜

眾所周知，史前遺址中出土的陶器是判斷該遺址文化屬性的最主要依據。跨湖橋遺址陶器的質地可分為夾砂、夾炭兩類。器形主要有釜、罐、豆、盤、鉢等。多數為圓底器及圈足器，絕不見三足器。採用輪製技術，這在一種光亮黑陶上可以清晰地得到辨認。輪製技術的出現，對以往認為長江流域最早運用於六千年前是個觀念上的衝擊。同時光亮黑陶本身也值得一提，在遺址中出土較為普遍，尤以豆（占豆類器的百分之四十三）、罐類中最常見，內、外壁皆漆黑光亮，決不亞於良渚文化的黑皮陶。有一定比例的彩陶，用彩的方式多種多樣，如軟筆類工具描繪、分次燒和點彩等。與河姆渡遺址（註八）僅僅發現三片彩陶片相比，跨湖橋遺址的彩陶片數量在浙江史前考古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和浙江其他兩個較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羅家角遺址（註九）和河姆渡遺址相比，跨湖橋遺址的絕大多數器型都較為獨特。以各遺址皆為大宗器物的釜為例（圖七），羅家角遺址最有特色的是腰沿釜；河姆渡遺址陶釜的形態較多，但帶脊是其共有的特徵；跨湖橋遺址則比較單一，以卵腹為主。在河姆渡遺址和羅家角遺址中，折沿斂口的器物是比較常見的，這種口沿在跨湖橋遺址也有發現，但只有極個別的例子，而且僅僅是口沿的相似，腹、底足部又完全不同（圖八）。跨湖橋遺址偏晚的地層中還較多地出土了一種扁腹罐，器型頗為獨特，在其他遺址根本不見（圖九）。



圖一一 聖水牛出土時狀況



圖一二 烏龜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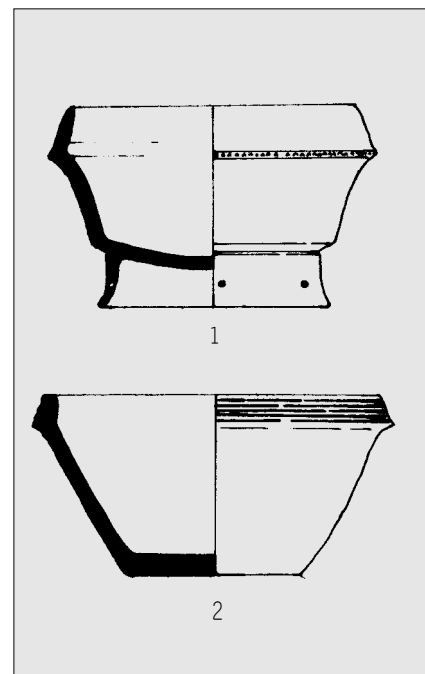


圖一四 部分炭化稻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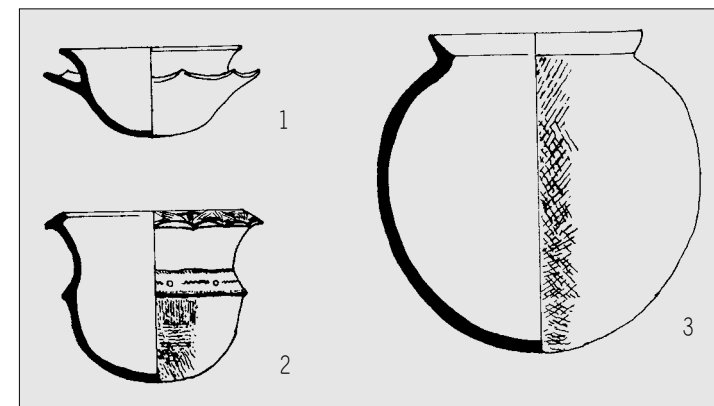
鑿釜插柄，釜的橫截面多呈圓形或橢圓形；羅家角遺址的發掘者語焉不詳地稱「在肩胛骨無脊一面的上端，鑿有較大的橢圓形未透釜」，觀察線圖，也應是頂端插柄法，但是釜的加工方法可能不同，釜的橫截面應呈扁體形；河姆渡遺址的則完全不同，是在肩白處橫向鑿釜，並在脊椎緣部位打雙孔，再用籐條捆綁木柄而成（註十）。從肩胛骨大小、厚薄判斷，跨湖橋遺址骨耜取材於一種比河姆渡遺址個體更大的動物，但是目前還沒有鑒定結果。從骨骼中已經鑒定出的動物種類有梅花鹿、四不像、聖水牛（圖一一）、狗、豬、揚子鱉、豚、烏龜（圖一二）、鵝鵝、大雁和一些魚類及獾貉類。

就跨湖橋遺址的發掘而言，目前給我們帶來的更多的是觀念上的衝擊。跨湖橋遺址位於錢塘江及其支流浦陽江的交匯地帶，古湘湖可能屬於古浦陽江流域（註一一），與古錢塘江入海口和杭州灣之間的關係較為模糊。處於姚江流域的河姆渡遺址和太湖流域的羅家角遺址也有類似的關係。這三個浙江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間，幾乎呈等腰三角形（圖一三），跨湖橋與羅家角直線相距五十餘公里，跨湖橋與河姆渡、羅家角與河姆渡直線相距均約一百公里。三個遺址都分佈在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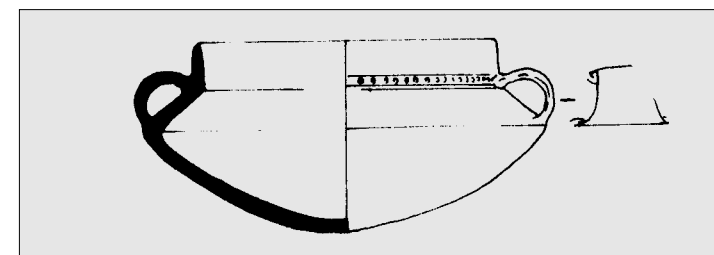
四、多源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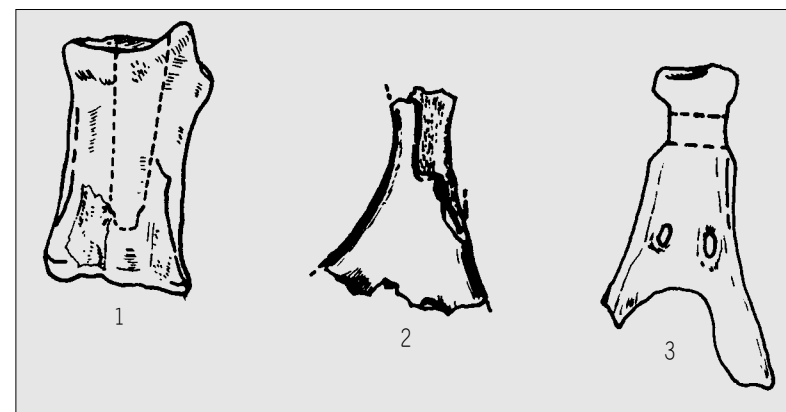
圖八 折沿欵口陶器 1. 跨湖橋遺址 2. 河姆渡遺址



圖七 陶釜 1. 羅家角遺址 2. 河姆渡遺址 3. 跨湖橋遺址



圖九 扁腹陶罐 跨湖橋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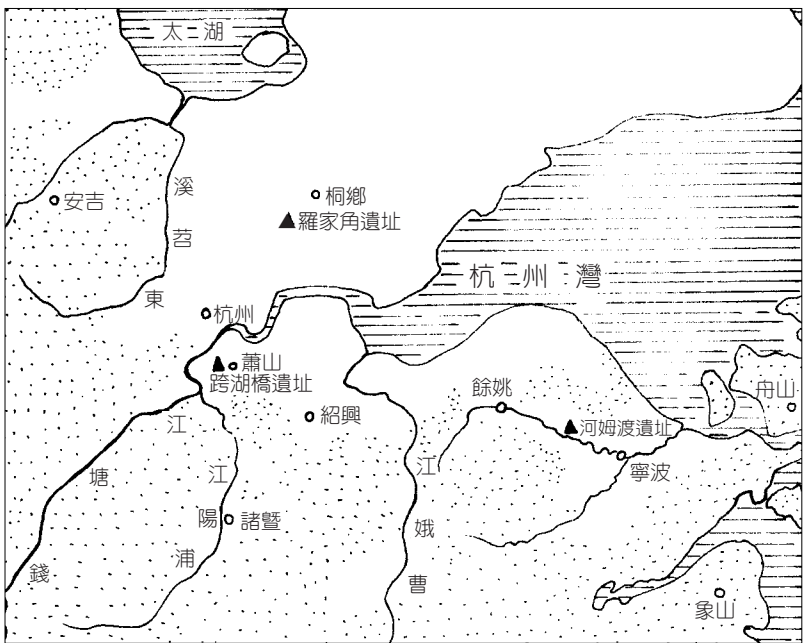


圖一〇 骨耜 1. 跨湖橋遺址 2. 羅家角遺址 3. 河姆渡遺址

以上例子只是器物外形的比較，如果深入到製作的技術層次，相信會有更多的差異和內涵挖尋出來。跨湖橋遺址歷年來發掘、採集了一批骨耜，幾乎都採用同一種加工方法。與羅家角遺址、河姆渡遺址出土骨耜相比，雖然皆使用偶蹄動物肩胛骨，然三地的鑿釜裝柄的方法不一樣（圖一〇）。跨湖橋遺址骨耜在肩胛骨頂端

近杭州灣的南北岸邊。從地勢圖上看，西、南兩面為山地，海拔較高，東為大海，海拔較低，而遺址正好坐落於三級地貌的中間位置，即山地與海灣間的沖積或淤積臺地上。每個遺址不但與海灣、大陸架和海洋之間完全開放，而且通過所在流域的河谷與浙西、浙西南和浙南山地也呈現開放態勢。

這種開放的環境使得我們想像三個遺址間可能也存在著目前尚不能確定的某種關聯，即使它們之間在時間上不能完全重疊或銜接。



圖一三 跨湖橋、河姆渡、羅家角三遺址地理、地勢示意圖

從外形看，三個遺址一些遺物確實存在相似點。如除了前述跨湖橋遺址與羅家角遺址骨耜插柄方法以及三地折沿斂口器口沿有一定類似外，河姆渡遺址與羅家角遺址的帶把鉢（河T36④：45）與單把鉢（羅T133③：14）、Ⅱ式敞口釜（河T30④：75）與Ⅰ式釜（羅T140③：22），跨湖橋遺址與河姆渡遺址的木鏃（跨T304⑦：8）與骨鏃（河T28③：28）以及骨針、骨哨、玉璜、石鏃、木鏃柄等，也都有其相似點。

現在知道自西元前六千年末起，處於新石器時代的西歐人就開始對湖泊和泥炭澤漫灘、沿岸感興趣（註一七）。因此，有必要吸取與跨湖橋遺址有著極其類似環境的某些新石器時代遺址的考古學研究成果。歐洲在這方面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如果能夠對已經獲得的跨湖橋遺址材料進行多學科綜合性研究，例如環境變遷、石器來料溯源、彩陶成分、製陶術、植硅體、動植物、古氣候等，以提高遺存的附加信息量，比我們匆匆給它下一個粗率的結論應該更有意義。

註釋：

- 一、五、蔣樂平、王屹峰、鄭建明、孟國平：〈浙江發現早於河姆渡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國文物報》二〇〇一年一月一日。
- 二、二〇〇一年度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名單見《中國文物報》二〇〇一年四月十九日。
- 三、《蕭山縣誌》，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關於西湖的現代專著參見R. Keith Schoppa. *Xiang Lake—the Centuries of Chinese Lif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四、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芮國耀）：〈蕭山跨湖橋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刊》，長征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 六、趙輝：〈跨湖橋遺址學術研討會討論紀要〉，《中國文物報》二〇〇一年四月五日。
- 七、一七、皮埃爾·白特甘（趙冰譯）：〈新石器時代湖邊居住和自然資源的管理〉，《考古學研究（四）》，科學出版社，二〇〇〇年。

浙江乃至整個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史前文化，決不會如以前我們所認識的那樣簡單，而是有多個源流譜系。例如跨湖橋遺址的炭化稻穀（圖一四），雖然出土顆粒數量不多，但在與浙江大學的初步合作中發現地層土樣標本的水稻植硅體含量很高。其意義不僅僅是又多了一處水稻發現地點和再一次印證了邊緣起源論（註一二），而且還提出了一個新問題，即在以長江中下游為中心的水稻產生圈（註一三）內跨湖橋遺址於時空上起著怎樣的一種鏈結作用。有學者還粗略比較了跨湖橋遺址與湖南等地長江中游史前文化的特徵，認為某些面貌上存在相似性。有意思的是兩地文化上可能存在的相似性還與同樣處於水稻產生圈內這一點相吻合。

然而問題的複雜程度遠不止這些。傳統的觀念認為遺址的主人來自山地，在浙江發現的五萬年前的「建德人」（註一四）是一個時間意義上的證據，最近在安吉、長興等地的新發現（註一五）可能會增強支持者在時間上而不是在邏輯上的信心和證據。現在有一些大膽聲音，暗示如果考慮海進、海退（註一六）以及遷徙、滯留過程中文化漂變等因素，甚至還可能存在遷徙自近海大陸架甚至更遠的可能性。如果考慮遷徙是在數千或數萬年內緩慢實現的，並且由於期間環境的多次變化造成流動的非單向性和反覆性，那麼這些假設並不矛盾。無論如何，這種與海洋的交流和聯繫的確存在著。

- 八、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浙江省博物館：〈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掘報告〉，《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一期。以下有關河姆渡遺址的資料除特別註出外皆出自此文。
- 九、羅家角考古隊（姚仲源）：〈桐鄉縣羅家角遺址發掘報告〉，《浙江省文物考古學刊》，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以下有關羅家角遺址的資料皆出自此文。
- 一〇、河姆渡遺址考古隊：〈浙江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掘的主要收穫〉，《文物》一九八〇年五期。此文中公佈了出土的用藤條捆綁木柄的骨耜實例。
- 一一、王屹峰、施加農：〈蕭山浦陽江下游史前遺存〉，《東方博物》第七輯，浙江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 一二、嚴文明：〈中國史前的稻作農業〉，《農業發生與文明起源》，科學出版社，二〇〇〇年。
- 一三、嚴文明：〈稻作起源研究的新進展〉，《農業發生與文明起源》，科學出版社，二〇〇〇年。
- 一四、韓德芳、張森水：〈建德發現的一枚人的犬齒化石及浙江第四紀哺乳動物新資料〉，《古脊椎動物和古人類》，一九七八年四期。
- 一五、張森水、徐新民、羅志剛、王恩林、劉斌、邱宏亮、梁奕建：〈改寫浙江無舊石器文化遺物地點的歷史〉，《中國文物報》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 一六、孫國平：〈甯紹地區史前文化遺址地理環境特徵及相關問題探索〉，《東南文化》二〇〇二年三期。